

華文社科學術期刊的國際化 與中國話語的生成

——以文化全球化與本土化為視角的解讀

李宏弢

[提 要] 近年來，華文學術期刊的國際化伴隨著中國國家文化體制改革的進程再次成為學術界、理論界以及行政主管部門關注並熱議的話題之一。而華文學術期刊的國際化又以文化全球化為理論背景，在探討全球化與本土化的過程中，中國話語權的生成是其魂靈與內質。以此為根基，華文學術期刊國際化要實現五個方面的轉換：即從傳統的封閉辦刊到現代的開放辦刊；從立足本土到期刊國際化；從單一紙質刊到多種存在介質；從單打獨鬥到集約聯合；從人文社科大綜合到專業刊，實現思維範式、生存理念、存在方式、辦刊模式和研究範式上的轉換。

[關鍵詞] 華文學術期刊 國際化 中國話語 文化

[中圖分類號] G255.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2) 04 - 0123 - 09

學術期刊國際化於我們已經不是新名詞^①，關於“學術期刊國際化”的探討也已經持續十餘年熱度不減，特別是在今天我國“文化體制改革”的背景下，學術國際化與學術期刊國際化更是熱點話題之一，而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提出的“在十二五期間培育15~20種國際一流學術期刊”這一目標，更是堅定了我國學術期刊國際化的信念與步伐。可見，學術期刊是否國際化，能否國際化，如何國際化，已經是需要我們認真思考的迫切問題。

一、文化全球化的趨勢與文化“軟實力”的構建要求學術期刊國際化

如何看待學術期刊國際化？這一問題實質上可以理解為學術期刊是否要國際化。就當前我國的文化發展現狀來看，國際化是大勢所趨。這主要表現在如下三個方面：

第一，國家的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戰略要求期刊國際化。弘揚中華文化，讓中華文化走向世界，是學術期刊國際化的使命，也是推動文化創新的有效載體，更是提高我國文化“軟實力”的途徑之一。文化軟實力是“軟實力”的子概念。所謂“軟實力”，最早是由哈佛大學教授約瑟

夫·奈 (Joseph Nye) 提出來的。在他看來，“軟實力” (soft power) 是指一個國家依靠文化、政治價值觀、外交政策等釋放出來的無形力量。它包括了文化影響力、競爭力、凝聚力、感召力和創造力等因素。“之所以稱作‘軟’實力，旨在說明，這種價值體系發揮作用靠的是自身的文化魅力和吸引力，而不是靠軍事、經濟強制力。”^②在今天，文化軟實力已經上升為一種國家戰略，這標誌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進入到一個更新、更高、更自覺的階段。“當今世界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科學技術日新月異，各種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鋒更加頻繁，文化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顯，維護國家文化安全任務更加艱巨，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要求更加緊迫。”^③可見，“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是經濟全球化語境中發展和提升綜合國力的需要，是滿足人民文化生活需求和引領人民精神生活追求的需要，是民族文化自身實現創新發展的需要，也是國際關係中推動建設和諧世界的需要，更是中華文化融入世界大文化的根基。因此，若無文化“軟實力”，又何談中國話語權？所以，我們必須打好文化“軟實力”這張王牌，才會有中國話語權。學術期刊作為文化傳播的載體之一，理應承擔起提升我國文化軟實力的使命，為中華文化的精深發展發揮自己應有的作用。

第二，全球化背景下要想贏得發展需要國際化。這就要求我們汲取世界各國、各民族的文化優長，促進文化交流。全球化勢如洪水，它就在我們還沒準備好的時候已經來到，無論你接受與否，這已成為不爭的事實。經濟全球化必然帶來文化的全球化發展趨勢。各個國家、各民族的文化就在碰撞與交流中不斷融合、發展。這種交流與融合，已經使文化突破了民族國家的地域限制並且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隨著當代全球化的發展，各民族國家的交往、聯繫日益增強，必然促進人類整體性的形成。這必然催生一種反映人類整體要求、經驗、利益的文化觀念。與此同時，全球化帶來的全球性問題也不斷出現，它要求人們從人類整體出發，以人類共同利益的價值取向來處理人與世界的關係，這必然推動一種反映人類共同利益、共同要求的文化形式的出現。這種全球意識和全球文化超越了特定群體，它的生成改變了過去文化與特定群體內在相連的特性，從而深化和拓展了文化的內涵。”^④這種全新的變化，讓我們看到了文化全球化已經逐漸超越了文化的地域性，特別是信息化、數字化的飛速發展，互聯網讓整個世界融為一體，這種全新的文化傳播管道讓以地域為特徵的傳統文化不堪一擊，超越了邊界的世界文化正在生成。從這一意義上說，文化全球化勢不可擋。

但是全球化並非文化的趨同，也並非否認以地域為特徵的各民族、各國家的文化。“全球化進程並不是某一個現代文化的普及和代替其他文化的過程，而是所有參與這個進程的文化體的重構性互動過程。”因此，全球化是一種現代意義上的文化認同，這種認同同樣以不同樣態的文化為根基，也即沒有了不同的文化為背景，便無從談文化認同。在文化認同的過程中，各民族文化不斷碰撞、砥礪以致發展。“全球化是多重文化的相遇。在原有文化基因的基礎上，不同的文化體不斷進行著自己的多重認同的構造，維護著自己的特性和完整性。”^⑤正是這種他者的認同，促使我們不斷豐富、發展中華文化，不斷提高本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和創造力，進而提升中華文化的“軟實力”。

第三，期刊國際化是構築國家文化安全戰略的需要。文化安全戰略是伴隨文化全球化而來的。“文化安全”在當代主要是指人們認為自己所屬國家—民族的“文化特徵”在全球化大趨勢下所呈現出的“安全感”，具體是指政治文化、語言和信息、國民教育體系等問題上的安全感。^⑥

對於文化安全戰略，學者們論述及關注較多，多從國家戰略、意識形態、信息安全、產業發展、弱勢民族國家的文化保護等方面予以觀照，鮮有從文化傳播與文化創新視角加以關注。如前所述，正因為有不同民族的存在，才會有千差萬別的文化存在的價值，才會有全球化這一概念的產生，全球化的文化認同正是以文化差異為前提和必要條件。那麼，如何讓他者瞭解文化差異？從文化生態平衡發展上來說，文化傳播顯然是其應有之意。當今世界，固步自封只能自我淘汰，文化霸權也並非我們的選擇。在文化傳播過程中，我們瞭解了傳統的與現代的、歷史的與現實的、民族的與世界的、東方的與西方的諸多方面的不同，讓我們有了對文化的辨識與選擇，在守護本民族傳統文化中能夠創新文化，保持文化的再生能力，促進文化生態的平衡發展，構築國家文化安全體系。對於有著悠久歷史的多民族國家來說，國家文化安全體系必將是多層次相互關聯的繁雜系統。在這個龐大的體系之中，作為文化傳播有效載體之一的學術期刊承載著傳承文明、促進學術進步與學術創新、繁榮文化的歷史使命，其將那些零散的、無序的、不確定的思想、文化經過整合形成完整的、有序的、確定的文化精品，在滿足受眾視聽的同時，豐富著受眾的頭腦以及實現文化自覺，達至文化養成。而這正契合了國家文化安全戰略構建的本意。

二、全球化語境下的文化差異與華文學術期刊國際化的瓶頸

如前所述，文化全球化是與經濟全球化相伴而生的，是世界各國家、各民族文化交融的結果，是對不同國家、不同民族間的文化認同。這種文化認同是以文化差異為基礎，其實質是價值認同。“文化認同的目的是尋求生存方式的同一性，但其過程卻是在發現差異時開始的。”^①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歷史、地理、風土人情、傳統習俗、生活方式、文學藝術、行為規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構成了文化。文化從來不是孤立的，它從誕生之日起，便具有了濃重的地域性、民族性特徵，這種地域性特徵即是文化的本土化。從這一意義上說，文化差異是天然存在的。而正是因為不同民族文化差異性的存在，這種差異性的文化的共生共存才讓世界變得如此豐富多彩。“如果說存在一種全球文化的話，這種文化不應該是一種文化模式複製的同質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構成的統一體。體現一致性的文化整合不是消滅差異，而是保留或展現差異。”^②離開了本土化的文化，必然是無本之木，因而也就沒有了生命力。同樣，作為文化傳播有效載體的人文社科學術期刊，也因為傳播著不同的本土文化才具有了深刻的內涵和存在的價值。

就華人文社科學術期刊而言，其國際化的過程就是一種文化認同的過程，但是由於文化差異的存在，勢必使其在國際化的道路上陷入兩難的境地，這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如何突破語言上的障礙，是華文學術期刊國際化的最大瓶頸。語言作為文化傳播的最直接的載體，具有鮮明的本土性特徵。在前現代社會，人類的交往僅限於操著同一語言的地域範圍內。但是隨著工業社會的擴張、現代文明的發展，人們的交往跳出了地域範圍，特別是在今天以互聯網為特徵的信息社會，人們的交往遍佈世界各地，地域界限逐漸消失，我們生活的世界不再以地域為基本屬性的國家或地區論稱，而被稱之以“地球村”，我們也被冠之以“村民”。

“村民”之間的交往及交流就需要有共同的“工具”，這就催生了世界通用語言的產生。不可否認，英語正是在這種情形下逐漸佔據了統治地位，並且以前所未有的態勢在全球範圍內成為科技、學術以及教學等的通用語言。這從如下幾個方面得到印證：

首先，在國際學術交流及科學發展上，英語扮演著統治語言的角色。這主要是因為以美國為首的英語國家在學術上的地位不可小覷。如世界上有名望的大學以美國、英國居多；美國的硅

谷是世界上科技最發達的地區。這些促成了英語霸權地位的產生。其次，世界上優質學術資源的地域分配導致了學術成果的語言霸權。以英語為第一語言的學術成果的編輯、出版佔據了主導地位，一些國家的教學、科研機構還以刊登在世界著名英語學術期刊上的論文為榮，甚至給予高額的學術獎勵。再次，在非英語國家，英語被作為必修的外語成為其教學課程之一。如在中國，學生學習英語是普遍現象，甚至幼兒園的娃娃就開始了英語的學習。而在那些英屬殖民地國家，英語更是本地的授課語言。這些國家的推波助瀾使英語的霸權地位得到鞏固，等等。總之，英語作為學術界統治語言的地位就這樣形成了並堅不可摧，這種以英語為主導的學術統治，給非英語學者及學術帶來了極大的挑戰。

儘管世界上有近五分之一的人口在使用華語，但由於語言上的巨大差異，在非華語國家，華語的使用少之又少，加之他們並未把華語作為必修外語之一（儘管我國在多個國家建立了“孔子學院”，客觀上促進了華語使用範圍的擴大），因此，很難與作為世界語言的英語相抗衡。而以華語為母語的學者，其學術成果主要發表在華文學術期刊上，語言上的差異阻礙了華文學術期刊在世界範圍的傳播。

第二，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具有較強的地域性特徵，同樣制約著華文學術期刊的國際化進程。人文社會科學無外乎是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總稱。“人文社會科學就是互相交叉聯結的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總稱，它以人的社會存在為研究對象，以探索、揭示人的本質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為目的，同現代科學體系中另外一大科學部類也就是自然科學既相關聯又相對應。人文社會科學追求的是科學與價值之間的和諧，它既要求把握人類精神活動的規律性及其實現的客觀真實性、合理性，又要求對人類自身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起積極的作用。”^②可見，人文社會科學是以人、人類社會為研究對象的科學，具有典型的人文特質和社會品性。這就決定了人文社會科學的地域性特徵，它是民族的，或者說是本土化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對象的不同、研究視角的不同，體現在文化上就是文化的特質性和差異性。

與自然科學不同，人文社會科學的許多研究領域具有民族性，體現不同的價值訴求。這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民族國家文化。正因為如此，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涉及民族國家、價值觀等的選擇上都有較為明顯的本土特徵，不具有上升到具有普世價值的全人類的文化層面，因而也就不能像自然科學那樣可以國際化和量化對比。此外，不同民族在形成發展過程中產生的不同的歷史文化、宗教哲學、文學藝術等，都屬於其文化中獨具特色的部分，這些構成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重要領域，這些領域的研究往往也難於國際化。以漢學研究為例，儘管近些年來世界學術研究出現了“漢學”、“儒學”熱，但研究者多為在中國本土之外的華人，華人以外的研究者則少之又少，寥若晨星。其原因即在於缺失文化根基。同樣地，有些本土的如中國歷史、中國古代文學等相關領域的學術研究，國際化也是難點。這首先來自於其研究是基於大量的華文史料，其次由於上述第一點的語言上的差異，好的優秀學術作品多以華文撰寫，且不說華文史料的“之乎者也”於當代的國人都並非人人皆懂，從文言文到現在通用的白話文需要寫作者的加工，此其一；而從白話文再借助翻譯而譯成受眾所需要的語言（如英文），同樣需要譯者的加工，此其二。在這一過程中，文化的內涵很難準確表達，如中國的四大名著翻譯成英文，五花八門，但沒有一個能詮釋出漢語的經典及雅致。

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文化全球化的發展，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出現了跨文化研究發展態勢，但這種跨文化研究主要是基於社會學、心理學、教育學、管理學等具有可操作性的社會學科，以

及關涉人類共同福祉的如環境資源、地球生態等方面的研究，或者基於不同民族文化的比較研究，等等。而那些與民族國家文化密切相關的領域卻很難進行跨文化研究。

第三，如何提高文化傳播能力，是華文學術期刊參與國際競爭的又一瓶頸。學術期刊國際化的過程實質就是文化傳播的過程。文化傳播力的強弱決定了一國參與國際競爭的能力，更是提升本土文化軟實力的重要指標。隨著冷戰的結束，各國間的競爭主要表現在文化等軟實力的競爭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信息化時代利用互聯網強大的跨區域特徵，以各種形式傳播著西方的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以此侵蝕著世界上各種本土文化。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民族、國家之間文化競爭的加劇。面對這種文化霸權主義，我們只有提高自身文化的傳播力，才能在文化競爭與文化衝突中不被洪流淹沒，才能增強自身的文化軟實力，提升綜合國力。從國際競爭看，“我國報刊國際傳播能力建設不強，在國際上沒有多少影響力……中國國內報刊的國際傳播力、影響力很弱，資產和年銷售雙超百億的報刊業集團還沒有，我國新聞媒體發出的聲音在國際上影響力有限，發自中國的真實聲音國際上往往聽不到，這與我國作為經濟大國的地位極不相稱。”^⑩儘管這是對我國報刊業整體發展的一個概括總結，但就學術期刊而言，其國際傳播力、影響力更是亟待提高，這樣才能在國際上傾聽來自中國的學術聲音。

從國際上看，傳播力較強的學術期刊都比較注重經營，期刊的運作引入現代化的管理運營及營銷策略。經營管理（Operating and Management）一詞來源於企業，是企業為了實現經營目的而進行的系列管理、運營活動。傳統觀念上，“經營”是那些走市場的大眾讀物類期刊的專用術語，而與受眾群體較為狹窄、專業的學術期刊並不相關。但進入信息時代的後現代發展階段，“經營”被廣泛應用於各個領域，學術期刊的“經營”同樣存在。這種經營意味著學術期刊如何發展、如何“推銷”自己。經營能夠實現目的與效果的統一，兼具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因此，對國內學術期刊而言，引入現代化的經營管理，是其國際化的必由之路。

第四，在國際學術上確立中國的學術話語權，是學術期刊國際化的根本。學術是學術期刊之源。沒有學術的長足發展，就談不上學術期刊的發展。因此，如何確立中國學術的國際地位，這是中國的學術期刊能否國際化的關鍵因素。這裡，國際地位寓意著一種話語權，即首先我能夠說話，進而我說的話具有一定的話語權威。因此，我理解的學術話語權，應該是文化認同的另一種方式，這應該是中國學術國際化的基本內涵。這種文化認同是一種利益訴求與利益表達，在研究方法上表現為兩種模式：其一為完全照搬國際上通行的標準，以此標準改造我們的學術生態，進而迎合了他者需求。這種完全放棄自我的模式顯然不是我們所要的，雖然這樣讓我們“融入”了世界，但是卻迷失了自我，這實際上是話語權的喪失而非確立。其二為揚棄，即有選擇地借鑒國際上能為我所用的方法，以此為進路研究中國問題，形成中國問題的國際視野，這樣讓我們既真正融入了世界，又充分展示了自我，求同存異並確立了話語權地位。

從學術發展來看，現代學術應該具備三個基本的要素，即：學術思想的表達、學術作品的發表以及學術思想的傳播。^⑪學術思想只有有效地表達出來，才能進入學術領域；代表學術思想的學術作品的發表，才能讓學術思想進入公眾領域；而學術思想的傳播不但要表達學術思想、發表學術作品，在現代社會還要借助現代化傳播手段予以傳播，才能被廣泛地知曉，才具有了“傳播力”。在中國學術國際化的進程中，如何增強學術的“傳播力”，平等的對話和溝通機制的建立是當務之急。當今世界，對話對於中西方學術界正變得越來越重要和迫切。對話是文化傳播的重要形式，沒有對話，就沒有溝通，也就無法實現傳播。這種對話機制可以是參與國際學術會議研

討，可以是和國外的學術研究機構互動學術交流，或者邀請國外學者來華訪學、研討，或者是就某一共同的學術話題的中西學術探討，等等。同時也正是因為建立在這一對話機制之上的學術才超越了本土界限，才具有了國際化的意義，才會在學術的交往中產生不同文化的碰撞，才會促動本國學術及文化的與時俱進。總之，是要讓學術“動”起來。唯此，才能在國際學術上形成中國的學術話語權。

第五，學術期刊的自身需求需要國際化。“在全球化時代，各種期刊之間的市場競爭已不再局限於一個地區或一國的範圍之內，而是被推到了國際平臺上進行激烈角逐。”^⑩可見，全球化時代促進了期刊國際化，這種國際化是一種被動的驅動，但當被推上了統一的平臺後，能否成為這一舞臺上的主角，既取決於期刊的定位，更取決於受眾的需求。因此，只有那些在國際上具有廣泛受眾面的學術期刊才具有國際化意義。而對於那些離開特定地域、特定民族即無生命力的學術期刊，國際化則無異於自毀前程。

學術期刊的國際化包含如下兩方面：一方面，要與國際接軌。所謂的與國際接軌，並不是要我們放棄本土文化、語言而都辦成了英文刊，而是在我們的學術話語權體系下，彰顯自己的學術研究風格。反對“趨同”，提倡“存異”，這樣才是正常的學術發展態勢。同樣，與國際接軌，其真正內涵應該是確立華文學術期刊的“國際化規範”，即要形成國際化的辦刊體制，要有國際化的作者隊伍、國際化的編委、國際化的審稿機制以及重視並引入同行評議等。另一方面，國際化還意味著刊物自身的“核心競爭力”的確立。這裡的“核心競爭力”應該理解為刊物主體意識的確立。所謂主體意識，意即要主動出擊，要能夠把握學術發展脈搏，能夠瞭解國際學術動態前沿，能夠把掌握的各種信息匯聚成一種主動策劃，引領、促進學術探討。

實踐中，學術期刊國際化還應從如下幾個方面促進內涵發展。首先，研究問題的國際化，這既可以是對同一問題的不同文化思考，也可以是不同問題的同源文化思考，總之是要把問題置於一個國際化的文化視野，這樣才能激發不同地域的學者的學術興趣，促進對問題的探討。其次，論文質量應國際化。我們說某一發明在申請專利的時候，總會用“創新”、“新穎”、“本領域的國際先進水平”等語詞來形容。同理，學術期刊刊載的學術論文只有處於本領域的前沿，有創新，才會吸引國際上同行的眼球，才會產生文化的共鳴，才會促成文化的傳播。再次，稿件來源要國際化。也即稿件應該不囿於本土範圍內，而是應該有不同地區、國家的學者的稿件，且外稿比例要高於內稿比例，這樣會提高學術期刊的國際知名度。最後，編輯視野的國際化。當代學術期刊的發展對編輯的要求不同於傳統的編輯只是負責文字加工，而是要求編輯具有專業的知識、對前沿問題與理論熱點的準確把握，更要具備策劃、組織能力，能夠站在專業化的角度，具有國際化的視野，這是期刊國際化內涵的應有之意。

三、華文學術期刊國際化的路徑選擇與中國話語權的生成

儘管在學術期刊國際化問題上無論是學者、期刊人以及相關行政管理部門都達成了共識，即國際化是期刊發展之必然選擇，但在實踐中，國際化對華文學術期刊而言，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這是因為國際化是一個在實踐中探索、漸進的過程，也是一個選擇、發展的過程。文化全球化的背景已經置中國於國際上的一席之地，形成了中國離不開世界、世界離不開中國的互存互動的局面。中華文化已經成為世界文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在世界的影響力日趨增強。全球範圍內的各民族之間的互動往來和相互依存已是不爭的事實。文化就是在這種全球化的趨勢中交融互

動向前發展著，離開全球化的孤立的本土文化已難以存在。因此，辯證地處理好文化全球化與文化本土化的關係，在形成中國話語權的基礎上，實現華文學術期刊的國際化才是順應時代的學術期刊的文化觀照。對此，華文學術期刊要實現如下幾個轉換：

第一，從傳統的封閉辦刊到現代的開放辦刊，實現一種思維範式的轉換。“一個民族在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一種穩定的、普遍起作用的思維習慣、觀念定勢和審視趨向，稱為思維範式。……民族的思維範式有著極強的穩定性，往往在一個很長的時期不為民族的政治、經濟和科技上的巨大變革所動搖。”^⑩而範式是包括規律、理論、標準、方法等在內的一整套信念，是某一學科領域的世界觀^⑪，因而具有指導性和示範性。這就使其在一定範圍內具有了公信力，成為一種公共認知模式。就華文社科學術期刊而言，長期以來處於一種封閉的、自我發展的狀態。如高校學報系列，目前中國內地高校幾乎一個學校一個學報，有的學校還兼具文、理、工、外幾種學報。從學報的定位來看，多數都是以服務本校的教學、科研為導向，自產自銷是其長期以來定位的結果。這種狀態下的學術期刊基本還處於解放思想之初、計劃經濟時代國家對學術期刊的定位，而中國三十餘年的改革開放也竟然沒有撼動這一體制。當然，也有一些改革意識和危機意識較強的高校學報，及早就進行了開放辦刊的嘗試，這些學報目前的發展顯然佔位已經高於其他學報，成為同類學術期刊中的佼佼者。如教育部名刊工程31家入選期刊等。這些學術期刊儘管立足本校，但又跳出本校的限制，把學術目光瞄準國內學術乃至國際學術，順應時代發展的需要，確立起現代的開放辦刊模式，實現了思維範式的轉換。這種轉換也符合了學術的開放性特點。學術作為社會文化的反觀之鏡，其開放性的品質推動並促進了社會進步。而學術期刊要想立足當今世界並不脫離時代，就要在開放的基礎上映照當下的文化樣態，進而實現學術的社會觀照。

第二，從立足本土到期刊國際化，實現一種生存理念的轉換。如前文所探討，學術期刊的國際化依附於經濟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發展。面對國際化的客觀現實，華文學術期刊國際化問題日漸突出，既要生存又要發展，還要做大做強，就必須把國際化擺在生存的首要位置，接受國際化的挑戰。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華文學術期刊在探索國際化的道路上取得了一定的進展，特別是科技期刊的國際化較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先行一步，這是因為科技在世界範圍內具有同一性，因此其國際化相對容易。但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的國際化就顯得相對複雜化，它以特定的人及社會為研究對象，受地域、民族、風俗、政治、社會等影響，因此其在國際範圍內表現出的更多的是差異性及本土性。就目前情況看，華文人文社科學術期刊國際化還十分有限。以國際上比較著名的人文學科學術論文檢索途徑SSCI（社會科學論文索引）和A & HCI（藝術與人文社會科學論文索引）為例，這兩個論文檢索數據庫面向的主要是以英語語言為根基的學術研究，因此其收錄的期刊也以英文期刊為主，而華文學術期刊由於語言上的差異，則很難被其收錄。當然，我們在這裡只是以此作為例證，並不考量其收錄期刊的合理性因素。這與當前文化多元化的發展並不相符。另一方面，華文人文社科學術期刊要想國際化，需要搭建一個能與國際學術同行進行平等交流和對話的平臺。只有在一個公共交流平臺上，才能進行學術對話，才能讓中華文化走向世界，讓中國的人文學科學術期刊走向世界，參與國際競爭。

但是，國際學術上不能缺少“中國聲音”與“中國話語”。國際上這種中國話語地位的形成是華文學術期刊國際化的基石。這種國際化既可以是“走出去”，也可以是“請進來”。從期刊的現狀來看，“走出去”需要一個過程，但“請進來”卻相對容易實現。華文學術期刊可以通過吸納國外的優秀學術資源，參與到國際學術交流的“話語”體系當中來。通過在全球化之“同”

語境中，尋找文化的差異性，在“自我認同”與“他者認同”中建立並形成思想對話機制。我想，這同樣是對期刊國際化的思維範式的解讀，是一種學術視野的轉換，更是生存理念的改變。

第三，從單一紙質刊到多種存在介質，實現一種存在方式的轉換。全球化與信息化在改變著人們的傳統生存方式的同時，也不斷地在改變著人們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全球化與信息化對學術期刊的影響亦是如此。以網絡傳播為特徵的信息化時代，文化傳播及交流體更方便、快捷，瞬間即能到達全世界的每個角落，其傳播速度之快和超地域的流動方式，形成了全球化的文化交往。各種互聯網絡傳播、即時聊天工具、微博、手機無線網絡等似乎擺脫了文化的地域、空間的束縛。作為文化傳播載體的學術期刊，如果還停留在單一紙質刊層面，那顯然是“落伍”了，也不符合當前文化快速傳播的趨勢。因此，學術期刊也應順應形勢，可以以紙質刊為基礎，拓展網絡報刊、手機閱讀等多種存在介質，使其存在方式多元化，適應時代的需求。

第四，從單打獨鬥到集約聯合，實現一種辦刊模式的轉換。集團化是國際化的必然前提，單打獨鬥難成氣候。這可以從兩個方面來對比。第一，國內好的學術期刊為什麼難以國際化，排除上述第二部分闡述的因素，其實國內的社科學術期刊基本還都處在各自辦刊、單打獨鬥的狀態。我們說一枝獨秀固然美麗，但滿園春色更賞心悅目。另一方面，我們再看看國際上著名的學術機構其旗下不乏優秀的期刊，少的幾十種，多的有幾百種。也就是說在國際上有影響力的期刊都是大的出版集團旗下的，這種集團化的出版模式可以讓學術期刊擁有一個傳播的平臺，這有利於文化取長補短促進發展，進而實現交流融合的目的。所以，集團化應該是國際化的必然前提。

關於這一問題，無論是學術期刊、還是國家新聞出版總署都意識到了應該走集團化的模式，才能國際化。在這方面，科技期刊已經起步，要比社科期刊先行一步。社科期刊的集團化發展，更有利於中華文化的國際傳播，促進中國學術國際話語權的生成。在探索中國學術國際話語權的生成上，一些辦得較好的學術期刊進行了積極的探索。如創辦英文刊等，但這些都是以刊物自身為基本，沒有形成集團化的模式，也可以說其影響還是很微小的。在集團化方面，目前一些社科學術期刊都在進行有益的探索。比如，以《中國社會科學》為首的六刊一報的運作模式是基於自身優勢力量的整合與集團化運作。而教育部名刊工程入選期刊以中國知網為平臺聯合創辦專業網刊則是打破校際界限，整合名校優勢學科，突破一校一刊、改變單打獨鬥各自為政的局面，在形式上更是突破傳統紙質刊的模式，借助網絡傳播管道，形成專業網絡期刊。從集約聯合來看，這種模式更符合以學科為基礎的學術平臺的搭建，是一種開放意義上的集約化、專業化、網絡化，具有一定的潛在發展空間。

第五，從人文社科大綜合到專業刊，實現一種研究範式的轉換。專業化是國際化的內在要求。當前，中國內地人文社科學術期刊的基本狀況是：綜合性期刊數量多，而專業性期刊數量相對少。這種比例關係一是不利於期刊的良性循環，二是浪費了本來就較為緊張的學術期刊資源。因此，當經過三十餘年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內地的經濟取得了飛速發展，但是經濟高速發展並未導致社會文化等的同步發展，於是，各種問題便凸顯出來。就學術及學術期刊而言，人文社科學術研究及其載體之人文社科綜合性學術期刊在近年來成為眾矢之的，廣為詬病。“學術垃圾”、“千刊一面”、“低水平重複”等評價一時間讓人文社科綜合性期刊聲名狼藉，“全、散、小、弱”成了其標籤。在全球化時代，在中國“大國崛起”之際，我們儼然成為了“文化大國”。但是，“文化大國”並非“文化強國”。我們有不下幾千種的人文社科學術期刊，但被國際上的學者所認同的又有幾種？拋開語言上的客觀障礙，恐怕我們還得從自身找原因。在國家提出建設

“文化強國”的戰略目標的同時，“文化傳播力”與“核心競爭力”成為其精神內質。因此，作為文化與學術載體的報刊的體制改革被提上行政日程。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就報刊體制改革也多次進行調研，面對國內眾多的綜合刊和國外學術期刊專業化等的比較研究中，總署提出專業化、數字化、集團化的學術期刊改革和發展方向。這種選擇符合全球化的文化發展需求，同時也是國內新聞出版產業成為國家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著力點的要求。因此，從宏觀的國家的文化體制建設方面來說，人文社科學術期刊的專業化改革勢在必行，儘管其進程可能會比較緩慢、過程會比較艱辛、情況會比較複雜。從微觀的學術研究來說，學術期刊的專業化更符合學術生態。就學者的學術習慣而言，對專業期刊關注程度會更高。當然，由於國內學術期刊的現狀，學術期刊專業化改革應該有計劃、有步驟、漸次地進行。這樣既符合中國國內的實際情況，又體現了期刊國際化的要求。

總之，在文化全球化和本土化的交融與堅守中，在開放辦刊和期刊國際化的道路上，在中國話語的生成上，華文學術期刊特別是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期刊還有很長的探索之路。學術期刊只有在開放理念下和國際化的思維中，走出一條自己的特色之路，於此，才能有所作為，才能實現其歷史使命。

①早在2004年，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副主任、魚類基因工程專家朱作言曾撰文指出：“通常情況下，一個國家能辦出有國際影響的學術期刊，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這個國家的科學技術水平，其影響可能比一個重點實驗室的影響還要大。如果我國僅有很好的實驗室和科學研究，卻沒有相應有影響的期刊，那是不全面的，也是令人遺憾的。”（《學術期刊國際化》，北京：《光明日報》，2004年3月1日）可見，學術期刊國際化既是展示一國學術期刊的發展水平，更是一國學術發展水平的體現。

②丁立群：《普遍性：中國道路的重要維度——一種文化哲學的思考》，哈爾濱：《求是學刊》，2012年第1期。

③《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

④王金寶：《全球化與文化研究範式的轉換》，天津：《天津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5期。

⑤韓震：《論全球化進程中的文化多重認同》，哈爾濱：《求是學刊》，2005年第5期。

⑥⑦參見劉慧：《全球化時代的中國文化安全戰略》，瀋陽：《社會科學輯刊》，2010年第3期。

⑧王曉德：《美國大眾文化的全球擴張及其實質》，北京：《世界經濟與政治》，2004年第4期。

⑨鄭文濤：《人文社會科學若干概念辨析》，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3期。

⑩新聞出版總署副署長李東東在中國記協第十七期“新聞茶座”上的講話（2011年11月17日），來源：全國高等學校文科學報研究會網，<http://www.cusjs.com/page/Default.asp?ID=592>，訪問日期：2011年12月25日。

⑪蔡曙山：《遵循國際學術規範是中國學術走向世界的重要前提》，北京：《中國科學人》，2004年第8期。

⑫王海科：《探尋期刊國際化發展之路》，北京：《中國出版》，2010年1月下。

⑬⑭陳穎健、張惠群：《新思維範式》，北京：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7~8頁。

作者簡介：李宏弢，黑龍江大學《求是學刊》副主編、副教授。哈爾濱 150080

[責任編輯 劉澤生]